

中国老会馆的故事

王日根 主编



山東畫報出版社

中国老会馆的故事



王日根 主编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老会馆的故事 / 王日根主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7

（中国故事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4-1287-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会馆公所—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D69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2384号

策 划 傅光中

责任编辑 许 诺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470

市场部（0531）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150毫米×228毫米

10.125印张 59幅图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在寄籍地所设“聚乡人联情谊”的组织机构，其所建馆舍，主要供同乡寄寓或岁时聚会。明初专门设为科举士子赴京师会试之用，故称会馆。另有一种行馆，属于地方性的同行业组织，亦称公所、公会。因此，会馆大致可分为官绅士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等多种类型。它既管理寓居同乡官员，又顾及同乡应试试子、工商阶层乃至一般移民，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会馆这种基层社会组织，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映照了中国乡土社会“官民相得”的人文关怀，较之近代西方传入的商会组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而当今仍然在海外华人社会大量延播和发展，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有谓会馆可追溯至汉代的邸舍（郡邸）、唐代的集贤院，然而此等机构仅与会馆在形式上有共通之处。近代学者瞿兑之《湖广会馆志后记》云：“自明以来，遐陬日辟，贡举仕宦行商于輶轂之下者，苦于人海之浩瀚，情意之难通，相率买屋宣南，以为乡人税驾问津之所。”可谓道出了会馆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真正缘由。明代以后，因应社会变迁而起的各种变革应运而生。会馆的大量涌现，与科举制度的全面铺开，商品经济的纵深发展，人口迁移的更大规模展开息息相关。明代以前，这些社会变迁因素虽有所显现，但不甚明显，或只是初见端倪。明代以后，商品经济较前取得了更充分的发展，长途贸易将商人在客地所遭遇的诸多不适应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远离家乡的客商对同乡性的社群组织有了

更热切的期求。较商人更早走出家乡的是参加科举、应征从军的一群人，唐代的边塞诗中将思乡情绪作了畅快的表达。明代，科举制度进入定制化、常态化的时期，不断培养出更多的易籍为官者，他们的汇聚足以彰显地方文化的实力。明清时期，移民浪潮出现了经常化、规模化、经济性的特点，不同籍贯的移民自然容易产生人以群分的效应，沿海区域的人们有的受商业贸易的牵引，有的则因为“海禁”政策的影响滞留海外，成为较早一批的华侨。于是，明清会馆不仅出现在京师省城，而且广布于山陬海澨、天涯海角。会馆里活跃的人物，不仅有官员、试子，而且有商人、一般性移垦者。会馆不仅在大都市广泛分布，而且在新兴的乡镇乃至海外各地均多有出现。

从会馆管窥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政治激进者们往往以对过往的否定来迎接新生的东西，而会馆则更倾向于在传承中更新，保持社会进步的渐进性，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会馆的基本功能在于“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实际上具备了社会自治的效果。传统的里甲、保甲、乡党式管理模式难以管理这庞大的流动人群，会馆却可以独展其长，经济而有效。会馆往往能融合寓居客地同乡中的官、绅、商等各个阶层，彼此调动各自的资源，形成互补的局面，有效地实现内部的自我整合、与外部世界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可以说，会馆组织使民间智慧在复杂的社会变迁面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对社会管理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

从会馆认识地方文化，不失为一可取途径。由于会馆对社会管理的效果是积极的，因而逐渐由民间自发产生发展到获得政府的默许、认可乃至保护，会馆由此成为地域文化的展示物，甚或发射器。随着社会变迁的革故鼎新，会馆的社会功能还有所延伸。到近代，会馆的社会治安功能进一步彰显。会馆在消除黄赌毒、杜绝民间私藏枪支、禁止罪犯藏匿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有的会馆还汇集资金，为政府的应急军需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些都反映了会馆顺应时势的内在品格。

会馆的思想倾向是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对维护世道人心具有积极的意义。于是，就职在外的同乡官员亦积极跻身于会馆的建设、维护与发展过程之中，以此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

会馆较之由西方引入的商会更多些人文关怀，更多些对人际关系、人生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追问，因而它不仅像商会那样旨在制定商业规



范，而且树立家乡的文化精神，彰显地方文化建设业绩，济助贫困的同乡人，参与乃至主持客居地的社会事业，给同乡人以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他们将家乡的英烈奉祀为神，无疑成了最强有力的粘合剂和凝聚器，同时为主流、优秀的价值观延存提供了基地。因此，即使是在商会移植进中国并大行其道之时，会馆的生命力并未削减。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20 世纪以来，各大城市中的近代商会组织纷纷建立，但旧式的会馆、公所仍然是城市工商业中的重要经济组织，它能把传统的地缘关系与现实的行业纽带融为一体，把旧式的人际关系与职业行规与近代的社会契约和民主意识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城市经济功能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既有新旧事物间的矛盾冲突，也有它们之间互补共进的发展。传统因素直到 1949 年仍在城市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1944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会馆正是植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并不断因应世界大势而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创造”。

由此可见，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颇具特色又不可或缺的社会中间组织，它标志着社会变迁的程度，映照了社会的演进，包容了官绅、商人及其他各阶层人们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意味着在传统行政体系之外的自立自治精神与有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从而在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由于会馆曾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会馆财产被没收，会馆活动被取缔，连会馆文献亦多遭遇散落的命运，乃至直到当下各类商会已遍地开花之时，我们仍难以追溯其本土文化渊源，仍多视商会为舶来品，是

西方文化的成就。我以为这是近代以来“文化自卑观”下的偏识，亟待得到根本性的纠正。为此，我们才能形成自我之信念，确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每个会馆均有自己起、盛、衰的节律，会馆志成为一窥会馆兴衰史的良好窗口。在中国历史上，国有国史，地有地志，家有家谱，因此，会馆志至少有与国史、方志、家谱一样保存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密码的意义。会馆志一般记录会馆的倡始、演进过程、运行机制、管理规约、捐输源流及其特点各异的社会功能，有的配有人物图像、土地、房屋产权四至图、建筑设置图等，有的则保存了会馆各个时期的契约文书，这既让读者便于窥见会馆兴衰的内在机理，亦可为当下社会组织建设提供参照，这对于挖掘和保存中国优秀的本土文化资源，借鉴和发扬传统乡土社会流动人口和行会社团管理的有效经验，同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会馆志是堪与国史、地方志并驾齐驱的重要史料，是中国流寓社会自组织力的实录。明清时期在北京就有约四百所的会馆，以官绅试子会馆为主，上海亦有近四百所的会馆公所，以商人会馆为主。其他像苏州、南京、杭州、武汉、洛阳、开封、天津、广州、福州、厦门、潮州、贵阳、昆明、重庆、成都等地都数量不等地分布着会馆组织，有的村庄都能找到会馆的遗址。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华人会馆广布于南洋各国，继而扩展至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至今仍呈蓬勃发展之势。当我们漫步美国旧金山的街头，从林立的会馆中，我们能感受到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遗存，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喜欢到旧金山的中国食品店购买食品。若干外国政要已在不同场合对华人会馆在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丰富当地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给与肯定。我们有理由相信，海外华人会馆具有与时俱进的不竭生命力。



目 录

前言 / 1

北京宣南会馆群落——百年文脉 文化渊薮 / 1

北京绍兴会馆——鲁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 11

北京潜山会馆——张恨水一举成名的福地 / 16

北京顺德会馆——朱彝尊传世之作《日下旧闻》的诞生之地 / 19

北京汉阳会馆——全面彰显清代汉阳举子科考胜绩的地方 / 22

北京安徽会馆——旧时王谢堂 今为百姓家 / 38

上海沪南三山会馆——十里洋场风云诡谲的战场 / 43

上海漳泉会馆——闽南商人在上海共同的家园 / 52

聊城山陕会馆——运河商业辉煌的见证 / 55

福州上下杭会馆群落——由政治中心演变为商业都会 / 61

福州两广会馆——两广人对福州贡献的证物 / 79

天津广东会馆——广东人北上天津的栖息地 / 90

重庆会馆——移民文化的熔炉 / 100

沅水沿岸古洪江会馆群落——黄金商业水道的璀璨明珠 / 102

汀州会馆——汀州人走四方的据点 / 109

会泽会馆群落——彩云之南的会馆之都 / 122

成都洛带的移民会馆——“湖广填四川”的产物 / 135

新加坡福建会馆——福建人下南洋的历史遗存 / 147

吉祥图案——中国古代会馆建筑的文气符号 / 157

明清会馆戏楼——中国固态戏剧文化的范例 / 191



妈祖信仰——闽商建设会馆的原动力 / 228

许真君——江西会馆里的乡土神 / 246

关帝信仰——山陕商人成就伟业的神器 / 280

会馆遗址——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历史见证 / 291

结语 会馆——中国文化遗产与更新的基地 / 305

鸣谢 / 314



北京宣南会馆群落

——百年文脉 文化渊薮

一、其时为周、其名为蓟

地处北京旧城西南一隅的宣南，曾因为士人荟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京师宣南文化，著名作家袁鹰曾感慨“赖有百年文气在，京城才觉重宣南”，而中国著名清史学家戴逸也由衷地赞叹宣南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精华”。“宣南”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地域概念，黄宗汉先生认为：“清代士人所称‘宣南’，泛指宣武门迤南一带，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地域概念。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地域的泛称，在清代士人诗词文集以及随笔、日记中多可见到，约定俗成，逐渐得到广泛认同。”

宣南地域虽不大，可是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已经存在着蓟、燕等国家，蓟国及后来兼并蓟国的燕国，都定都于蓟城，蓟城即在今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宣武区。此后，自秦汉一直到隋唐，蓟城之名虽屡经变化，可是城址却一直在今宣武区一带。到辽代时，辽国将幽州改为陪都，称燕京。金代贞元元年（1153），金朝统治者正式迁都燕京，改名中都。辽之燕京和金之中都，城址依旧在宣武区。到元代，北京正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正统王朝的帝都。元至元四年（1272），在金中都城东北营造新城，称大都城，宣武区此时位于大都南郊。明清时期，仍以元大都为王朝首都，宣武区在外城西南一带。1995年，宣武区政府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在今广安门滨河公园内修建了一座“蓟

城纪念柱”，上面用篆书刻着“北京城区肇始于斯地，其时为周，其名为蓟”。

明清时期，宣武、崇文一带为北京外城，并形成了商业聚集区和仕宦聚集区的分野。《旧京琐记》中记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商业聚集区和仕宦聚集区分野的形成，概因明代大运河终点码头从积水潭南移至北京城东南角外的大通桥一带，于是北京的前门和崇文门成为商贾辐辏之地，逐渐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且清朝定都北京之后，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汉族除非得到许可，一律只能住在外城，汉族官宦之家及文人墨客也不例外。官宦士人多不愿与行商坐贾混同居住，于是多聚集在宣武门一带。

二、斯文一脉

宣南是有名的士乡，早在清朝初年，文人、学者便汇聚于此，更有不少学界泰斗宗师游学著述其间，百年的人文荟萃使得宣南地区形成了浓厚的人文气息，且斯文一脉，百年不绝。

清顺治年间，“江左三大家”中的吴伟业、龚鼎孳以诗会友，相互酬唱，在北京留下了他们的鸿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史学家谈迁不远千里来到北京，他在此搜集史料、潜心著述，留下了传世之作《国榷》。当谈迁正登高涉水，盘桓于断壁残垣之间时，另一位史学家孙承泽则在《研山堂》中默默耕耘，写下了专门记述北京历史的《春明梦余录》和《天府广记》。稍晚一点的顺治十六年（1659），被誉为“清学开山”的顾炎武，则牵着两头驼满书籍的骡子，漫游于北京各地，并不时去拜谒一下明十三陵，以寄托其故国哀思，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也最终凝结为《昌平山水记》和《京东考古录》。

康熙年间，为了延揽山林硕儒，于康熙十七年（1678）首设“博学鸿儒”特科，康熙十八年（1679），清朝又重开明史馆，一时饱学硕儒、学界宗师更是齐聚北京，其中便有史学大家万斯同和经学大师阎若璩、胡渭。万斯同师从一代学宗黄宗羲，是当时一流的史学家，他力辞博学鸿儒科之荐。后清廷重开明史馆，大学士徐元文延聘他供职明史馆，他以“不署衔、不受俸”“以布衣参史局”为条件，在北京修史十九年，



为《明史》的撰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阎若璩、胡渭也数游京师。阎若璩康熙元年（1662）首次游历北京，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不第，但是颇受时人的礼重。徐乾学、李天馥都将他奉为座上客，尤其是康熙皇帝四子胤禛对其“呼先生而不名”“相待甚厚，逾于宾友”。阎若璩去世后，胤禛又“遣官经济其丧”，并“亲制挽联四章以悼之”。另一位经学大师胡渭，15岁进京师太学，后从徐乾学修《一统志》。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南巡，胡渭献《平成颂》，被召至南书房值庐。

乾隆时期，乾嘉学派开始形成，汉学“吴派”“皖派”齐聚北京，极盛一时，使得北京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乾隆初年，吴派领袖惠栋治学于北京，被人誉为“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大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意味。后王鸣盛从惠栋问学，终成一代史学大家，为后世留下《十七史商榷》。吴派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钱大昕也曾治学于北京，他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四十年（1775），前后在京二十余年，被誉为“自开国以来，蔚为一代儒宗”，他学识广博，清史列传称他“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他的《二十二史考异》对后世影响极大。正当吴派在经、史领域开辟新的学术土地时，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也应声而起，一时间形成“吴皖争流”的壮观景象。戴震早年问学于著名学者江永，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因为躲避仇人，在北京“困于逆旅，人皆以狂生目之，几不能供饘粥”，但是勤学不辍。后来与纪昀、朱筠、钱大昕、王鸣盛等交游，声震京师。他曾参与编修四库全书，且在经籍、音韵、名物制度、古天文地理方面都做出重大的学术贡献。

在京游学著述的硕儒宗师中就有不少人是寓居于宣南，文士学者的荟萃也使得古老的宣南成为学术渊薮，因百年文气而名重京华。

顺治年间诗坛宗匠龚鼎孳、吴伟业寓居于宣武门左，他们在此，结纳海内文士，不少诗人慕名而来。因寓居宣武的吴伟业、曹溶、霍达，熟识明代掌故，且藏书丰富，史学家谈迁与他们过从甚密，或“借旧邸报若干、悉携以归”，或“以《国榷》近本就正”，有时还“饭于吴太史（吴伟业）所”。在宣武门外琉璃厂西南，坐落着享誉全国的“孙公园”，孙承泽寓居、著述于此。而从琉璃厂西门外穿过南、北柳巷，有一条海

北寺街，清初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在此写就了传世之作《桃花扇》。这条街里还坐落着古藤书屋，中和殿大学士金之俊寓居于此。康熙二十三年（1684），一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由皇城搬到这里，正是在这座古屋中，朱彝尊秉烛夜书，呕心沥血，完成了《日下旧闻》。与此同时，王崇简、查慎行、李渔、王士禛、毛奇龄都曾寓居活动于宣南一带，在此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宣南的百年文脉一直延续到 19 世纪前半叶和晚清时期。清末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1792—1841）曾在宣南上斜街居住，他在上斜街的宅邸前为住宅，后为花园，静雅清幽，此宅后来成为北京番禺会馆。龚自珍还在下斜街一带居住过，他曾写诗怀念道：“难忘槐市街南宅，小疏群芳稿一车。”龚自珍是清末进步思想家，他对清末腐朽的政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更法”“改图”等主张。他还研究边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图志》等，并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积极抵抗列强的侵略。龚自珍还是清末诗歌革新的先驱，他认为诗“曰圣之时，以有用为主”，一洗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龚自珍之后，晚清最杰出的诗人黄遵宪也曾居住在宣南香炉营的广东嘉应会馆。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人举起了“诗界革命”的大旗，反对长期笼罩在诗坛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潮。“诗界革命”虽是梁启超等首倡，但真正以作品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的却是黄遵宪。黄遵宪的诗歌不仅将世界奇异风物和新的文化思想融入自己的诗歌，而且没有牺牲诗歌的艺术品质，因而他也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 20 世纪诗界中”，成为“诗界革命”的旗帜。

清末的宣南不仅生活着中国最杰出的诗人，还有着著名的学者。

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入住宣武区米市胡同内的南海会馆，以后他数次进京都住在这里，南海会馆成为他维新变法的起点。为了鼓吹变法，他完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成为今文经学的殿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入京，居住在宣南金井胡同。沈家本在寓所修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名曰“沈碧楼”，里面藏书五万余卷。1910 年，沈家本被保守派攻击离职之后埋头著述，曾有诗云：“与世无争许自由，蜗居安稳阅春秋；小楼得书数千卷，



闲里光阴相对酬。”并最终将其编成《沈碧楼丛书》12种。沈家本是中国传统法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主持制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新刑律草案》《大清现行刑律》等。与此同时，沈家本又精通西方法律和法学，并将其引入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律的制定之中，他主张司法独立、公开审判、律师辩护和陪审团制度，成为中国现代法学开风气的大师。

进入民国之后，宣南的文化氛围更是浓厚，这里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新文化运动健将，而且是众多报纸杂志馆所的所在地；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戏曲大师们也多寓居于此，并在此献艺、授徒教学，而民国初年的众多画家们则在此成立“宣南画社”。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他锐意进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积极延揽各色学者进入北大从事教学研究，使北大一时成为中国文化重镇。1917年，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北上的陈独秀落户东安门箭杆胡同，并常常在宣南安庆会馆居住，他还以徽籍身份在安徽泾县会馆里与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陈独秀到北京后，还把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迁入北京，《新青年》《每周评论》成为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的重要阵地。1917年，陈独秀与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首倡“文学革命”，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新文学的开始，一时间宣南常常可以看到新文学拓荒者的身影。

鲁迅曾在宣南绍兴会馆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在藤花馆里他创作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还写下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著名杂文。当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新文化运动的同仁如钱玄同、刘半农等常常来此聊天、交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来北京后，也在绍兴会馆里与鲁迅切夜长谈，不由让人想起苏轼、苏辙兄弟北窗对谈的温馨。蔡元培也曾到此看望过周氏兄弟，留下了可贵的相知之谊。

1919年和1920年，两个怀揣着到北京大学求学美梦的年轻人先后住进了宣南的潜山会馆和西西会馆，他们就是后来的文学大家张恨水和沈从文。张恨水和沈从文一先一后从家乡多少有些落魄地赶到北京，由于根本没钱进大学，而且要为基本的生存奔忙，他们只能去北大旁听或在工作之余自学，但他们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正是在西西会馆，沈从文开始了他向文学的进军，而张恨水则在潜山会馆创作了《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著名小说，成为中国通俗文学的大家。

正当鲁迅等作家在新文学王国里开疆拓土时，住在宣南芝麻街的林纾则正用优美的古文翻译着外国文学名著。林纾不懂外文而成为翻译大家，在中国可谓仅此一人。林纾古文为时人推重，他也自视甚高，称“六百年中，震川（归有光）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林纾翻译先由人口译，然后再根据口译写成古典中文，他的翻译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翻译时文思敏捷，据说往往口译者的话音刚落，他的译文就已写成，被人赞为“耳受手追，声落笔止”。林纾就是用这种堪称奇特的翻译法翻译了一百多部欧美文学作品，其中《巴黎茶花女逸事》《黑奴吁天录》尤其著名，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肠”的美誉。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北京的报纸杂志也繁盛一时，全国近九分之一的报纸和通讯社落户北京，其中《每周评论》《京报》《社会日报》《晨报》等著名的报纸杂志的馆址就在宣南。这里还聚集了像李大钊、陈独秀、邵飘萍、林白水、张恨水、成舍我等民国时期的著名报纸创办者。

民国的宣南不仅是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报业杂志的天堂，还是戏曲、绘画等艺术的圣殿。早在清初，孔尚任就在宣南海北巷里创作了中国著名古典戏剧《桃花扇》。民国时期，享誉大江南北，与杨小楼、梅兰芳并列为京剧“三大贤”的余叔岩就住在宣南椿树上头条。“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也寓居、授徒于宣南椿树诸胡同，而李万春、张君秋则分别居住在宣南北大吉巷和后兵马街一带。民国初年，宣南还建有闻名全国的《宣南画社》。1915年，居住在宣南骡马市大街西砖胡同的余绍宋与司法部的同仁林宰平、梁和钧、胡子贤、杨劲苏、孟莼荪、刘崧生、余戟门、蒲伯英等十余人，邀请江南名画家汤定之指导，组织成立了“宣南画社”。后来陈师曾、梁启超、金城、林纾、萧俊贤、陈半丁、沈尹默等也相继参加了画社活动，有的定时，有的不定时，每次聚会最多时达二三十人。陈师曾、姚华被尊为“领袖”，金城则被奉为“广大教主”。宣南画社对于促成北京画坛形成有着直接的贡献。

历史悠久的宣南不仅是清代前中期的士乡、晚清学术的结穴，进入民国时期，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和新文学、新艺术的摇篮。百年的人文荟萃形成了“斯文一脉”，并绵延不绝。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栖身其中的众多会馆和人们濡染着、吸收着中国传统、现代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优秀的文化。宣南的百年文脉，创造了宣南会馆这一中国文化



的渊藪。

三、北京宣南的士人会馆及其近代转型

会馆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管所，供同乡同行业集会、寄寓之用。（《辞海》）会馆兴起于明代的京师，明代初期至中期，是会馆的初始阶段，其特征主要是官绅阶层的聚乐场所。清代以后，会馆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各类会馆遍布全国各大都市和城镇，会馆发展进入它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会馆功能也逐渐分化与明确，形成了为士人服务为主的试馆和为商人服务为主的商业会馆。

北京作为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辐辏之地，来自全国各地士人、商人及各色人等如百川归海般涌入北京。但是，这些人口多为流动人口，仅在北京做或长或短的停留，为了解决自己的寄寓问题，在各省、府和县的绅商的领导下，北京建起了各色会馆几百所。在北京的大量会馆中，士人会馆占据着绝大部分。据吕作燮先生的统计，清代北京有会馆 387座，其中为同乡寓京人士而设的占 92%，为同乡商帮而设的占 6%，行业性的仅占 2%。北京大量士人会馆的产生是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的。中国明清时期实行科举制，每逢丑、辰、未、戌年春天在北京举行会试，称“春闱”。因而每逢会试之时，数千甚至上万举人进入北京应考，很多考生甚至提前到来，寓居北京进行攻读备考。1898 年，梁启超曾这样描绘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的情形：“邑聚数百童生，擢数十人为生员；省聚万数千生员，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天下聚数千举人，而拔数百人为进士。”士人会馆的基本功能，正是为这些参加会试的举人提供食宿攻读之所。道光六年（1826）《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的作者这样写道：“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士者。自举人不逮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既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乾隆十年（1745）《休宁会馆碑文》也写道：“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地，风雨和会，车书翕至，飘缨纓组之士于焉云集景从，遇乡会试期，则鼓篋桥门，计偕南省，恒数千计，而投牒选部需次待除者，月乘岁积，于是寄庑僦舍，迁徙靡常，炊珠薪桂之叹，概伊昔已然矣。时则有室置宇，以招徕其乡人者，大或合省，小或郡邑，名之曰会馆。”

为了保证会馆能为那些不远千里赶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却又居无定所的学子提供一个安定的住所，士人会馆一般都定有极为严格的入住条件。士人会馆常常会明确规定拒绝接纳商人入住，即便是商人参与投资管理的会馆也不例外。如乾隆六年的歙县会馆《会馆公议条规》规定：“（会馆）创立之意，专为公车以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此外，士人会馆一般也规定，家眷不得与寄寓者一起居住于会馆之中。如歙县会馆《会馆公议条规》规定：“非乡试之年，房屋虽空，京官有家眷者，及凡有眷人，皆不得于会馆居住。”若遇到乡试之年，则参加考试的士子有优先入住权，如《泾县会馆新议馆规》规定：“其遇乡会试之年，如本邑应试人多，凡住馆者即当搬出，以重考试，如有占住迟疑不让者，公同辞出。”

北京众多的士人会馆为进京参加考试的士子提供了便利，大量名垂史册的人物曾在北京宣南会馆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来北京参加会试，住在宣南一带会馆之中。光绪七年（1881），蔡元培进京参加会试，住在浙江绍兴会馆，后来他入掌北京大学，使之成为中国学术文化重镇和新文化的坚实阵地，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校长。戊戌维新的领袖们也活动在北京的会馆中。光绪八年（1882），康有为第一次进京，入住米市胡同内的南海会馆，以后他数次进京都住在这里。南海会馆成为他陈述改良中国思想的第一站，也成为轰轰烈烈的戊戌维新的思想中枢。康有为的弟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也住在南海会馆，并在此被晚清政府捕获。光绪二十年（1894），21岁的梁启超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邑馆中院的三间瓦房中，并给房间取名“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他在饮冰室写的文章风靡全国，对20世纪前后的中国文风影响颇大。另一位为维新变法献出生命的志士谭嗣同入京后则住在浏阳会馆，他将自己所住的房屋命名为“莽苍苍斋”，并题写了一幅门联，上联是“家无儋石”，下联是“气雄万夫”。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士人会馆失去了原来为进京士子服务的功能，原来入住条件的限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士人会馆开始成为该籍所有旅京人士的栖息之地。学者、学子、新闻报业人士、革命团体、贩夫走卒都在此停留，或寓居创作求学、或办杂志报刊、或从事革命活动、或引浆贩卖，可谓成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渊藪。